

换一种眼光看节后招工难

■ 黄春景 职员

每年春节过后,各地“招工难”的话题都持续引发关注。今年,这一问题是否依然突出?日前,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随着许多劳务输出大省,特别是中国西部省份经济不断发展,一些打工者选择就地发展,节后不再外出打工。致使许多外地企业月薪4000元都难招到人。据统计,劳务输入大省广东今年节后缺工人数将达18.91万。(2月23日中新网)

节后是企业用工的高峰期,于是企业急得频出奇招招工。但是月薪4000元仍难招到人,这说明招工并不仅仅体现在薪酬方面,其他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在笔者的印象中,这几年每每春节过后,舆论都要吆喝一阵“用工荒”,但节后招工难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趋严重。为了缓解被动局面,企业想方设法破解“用工荒”难题,纷纷上演抢人大战。在笔者看来,节后招工难的背后,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毕竟务工多元化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何说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不应调控

■ 舒圣祥 时评人

延续去年下半年的行情,新年假期结束后,一线城市的楼市继续火爆。针对火热的一线城市楼市,深圳、上海等纷纷出台调控政策,未来不排除进一步收紧的可能。业内人士预计,一线城市楼市的量价齐升最多持续到今年上半年,下半年,新一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有可能会来临。(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房价问题有日子没上头条了,明明很多地方都还是楼市寒冬,深圳房价去年却一枝独秀不断猛涨,北上广如今也有跟进之势,于是,中国楼市呈现出史上罕见的“二皮脸”现象:一线城市的火爆,搭配三四线城市的冷清。以前,楼市往往是全国一片红,区别仅在涨幅大小;如今,却呈冰火两重天之象,一线城市对全国楼市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深圳出现众筹买房联合炒房,投资客包楼盘慢慢卖”,类似新闻甭管是否属实是否夸大,反正业内人士已经喊出了调控的声音,地方政府显然也在着手准备——对于当下的暴涨,很多人以灾难视之,仿佛到了拆毁泡沫的最后一刻。但是放眼全国楼市,中央政府正忙着去库存,取消限购、降低利率、降低首付、降低契税等举措,一个接一个在推出。这无异于出了一道难题:在全国楼市去库存的大背景下,一线城市房价大涨要不要调控?如何调控?

笔者的看法是,不应该。一方面,一线城市限购政策并没取消,降首付、降契税也基本将其排除在外。换言之,过去的调控政策并未取消,现在如果再推新举措,其实就是调控再加码。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当下的楼市火爆,说明过去的调控政策其实只是“纸老虎”,为什么我们那么自信,在“纸老虎”身上再糊一层纸,就一定更有遏制房价上涨的效果?恰恰相反,加码调控的暗示只会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息:又要调控了,还得涨,赶紧买。

某种意义上,政府的调控很多时候会被购房者看做房价“只会涨不会跌”的“保票”。因为房价暴跌是政府部门不愿看到的,所以才要限制大幅上涨;政府部门急着调控,说明暴跌的概率极低,“看得见的手”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种可能。试问,得了这样的“保票”,加上“越调越涨”的过往经验,购房者还会真正理性吗?要让市场变得理性,就不能用政府的调控来代替甚至取消市场的惩罚。

张五常先生说:“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价格的或高或低是重要而又可靠的处理人口分布的法门。”一线城市的房价大涨,其实也是一种人口挤出效应。一方面,一线城市都宣称要控制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却又禁止市场的力量(比如房价)发挥作用。这是一种自相矛盾。“住有所居”绝不是说人人都要在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三四线城市的楼市,不都在去库存吗?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对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作用或许要远胜于当下采取的各种刺激举措。

更何况,就算要对一线城市房价大涨加码调控,至少也要先搞清楚上涨的原因,此时突然上涨,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想来想去,其实很多要素都没有变,变的大概是利率下调、股市低迷、街区制推广。加码调控,难道是要在一线城市实施单独的房贷利率?难道能人为把股市搞得像去年上半年那么火?难道是要收回“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新规?如果这些都不能,那么,又该怎样有的放矢地有效调控呢?

首先是农民工选择了就地发展。浙江今年2月初发布的《2015年全省人力资源供求分析报告》显示,去年来浙江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占比下降。浙江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数据显示,2015年求职人员中外埠人员所占比重为48.11%,较上年同期下降2.51个百分点。外来务工人员不再愿意选择到异乡打工,就地发展成了他们的新选择。近年来,不少地方的发展越来越快,企业越来越多,工作机会也不断增多,农民工很多都在考虑回家乡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萌发了返乡创业的意向。农民工回乡创业,开辟了农民增收新渠道,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加速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可谓好事一桩。

其次是倒逼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招工难的背后,凸显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促使企业在硬件方面增加技改投入,提高创新力和竞争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要加快改造生产线,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另一方面要从代工企业向品

牌企业过渡,培育品牌,开拓内销。尤其是在招工难的大背景之下,企业走自动化之路也许将成为一种新趋势。此外,招工难还进一步倒逼企业在“软文化”方面大打“温情牌”,讲究“以情留人”,通过抓牢企业文化,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等举措,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以此缓解用工荒。

再者,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过去,农民工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比,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等。如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和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更渴望人文关怀,对尊重、平等、社会承认有着更多的期盼。随着劳动力从过剩变成了日趋短缺,特别是招工难的持续发酵,必将使得劳动者的地位得以大幅提升。换言之,只要企业持续有求于人,必然要在用工对象上赋予更多的尊重和更好的待遇。只有把农民工招待满意了,企业才能在破解用工荒上迈出关键步伐。

“不强制个人网店工商登记”当为常态

■ 邓海建 媒体人

在22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介绍,今年年底前,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完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全国一张网”。同时,张茅表示,不强制要求个人网店进行工商登记,不具备工商登记条件的网店,应向其所在的第三方平台登记相关信息。(2月23日新京报)

古今中外,对于引车卖炭的贩夫走卒,市场管理就当怜其三分。

小本网店,营生不易。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消费疲软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不起眼的小店面,可能承载着年轻人的一日三餐……去年2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阿里巴巴举办的培训班上获悉,淘宝集市店有600多万个卖家,真正赚钱的不足30万个,仅占5%;天猫商城店,6万多个卖家,不亏本的,不足10%。无独有偶的是,央视也曾做过一期《伤不起的淘宝村》,来讲述淘宝上小商家的艰难处境。数据当然是流动的,但,纵使

管理者并无“雁过拔毛”的初心,只要事实地增加其营商成本,对于小卖家来说,都有可能就是压垮其斗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市场不仅讲“情”,还得要讲“理”。一来,早在2010年7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对自然人开网店进行了规范,除了要求实名登记之外,推出了允许可以不经工商登记的特别规定。这个规定被2014年实施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2014第60号令)认可,并得以延续。二来,工商登记仅仅是种效力有限的职能,并不能对假冒伪劣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业内所言,“问题的解决反而更依靠平台的网络技术和信用体系建设,而不是设定事前许可”。从逻辑上说,事前增加网店审批手续,就能保证店主往百年老字号的路上狂奔?这想法太过天真了。再说,自古以来,自然人之间的小本交易,本就是自由而多元的状态,无须公权事无巨细去插手。

有两组数据是需要珍视的:一是近日,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正式发布了



说到底,节后招工难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道值得社会各界合力解剖的时代课题。节后招工难所呈现出来的,既有令人忧心之处,亦有可喜的进步。“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上演,必须要有一套政策和制度“对症下药”。而对于招工难背后的可喜现象,这可以说是时代发展衍生的“附加红利”,尤须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并进行合理的引导。当可喜的现象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节后招工难渐渐地得以有效化解,因为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都在这一难题上默默地持续发力,招工难自然也就不会长期“高烧不退”。

《2013和2014年度企业年报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3、2014年度小微企业年报数量达1088.54万户,同比增长27.14%,反映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有关扶持政策初步取得预期效果,逐渐形成了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新格局。二是2015年的数据称——10年前,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是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16.39万亿元。小微企业双创活力刚被激发出来,减税减负成为潮流、贴身服务成为主流,于此而言,“不强制要求个人网店进行工商登记”当成为合情合理的制度预期。

今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主管的《中国工商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自然人网店应办理工商登记》的研究性文章,“个人网店是否需要工商登记”也再次引发热议。当然,试探也好、铺路也罢,强制登记的想法终究没有照进现实。开局之年,万事艰难,激活双创热情、捍卫市场活力,不妨就从“不强制个人网店工商登记当为常态”的共识开始吧!

市场岂能成搅局者的挡箭牌

■ 晴川 机关行管人员

同一种药,同一厂家,同样剂量,同样的生产批号,但在福州鼓楼区圣庙路33号的协和药店中,商品名为“美林”的15毫升装布洛芬混悬滴剂,售价几乎是三甲医院中的近两倍。前两日,福州有市民在购药时就遭遇了这样悬殊的价格。对此有关部门称:药价不同,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目前无法干涉。(2月18日《海峡都市报》)

同一药品,药店价格竟然比医院高出近一倍,这无疑颠覆了人们的惯常认知。而有关方面做出的“市场行为无法干涉”回应,听着似乎没问题,但细细揣摩,却明显是在搪塞卸责。

市场要义在于竞争。当初之所以放手药店在医药市场发展,就是出于打破

医药垄断格局的战略考量,通过药品市场主体拓展带来的竞争,来推进医院医药分家的进程。而药价越是透明合理,老百姓越容易得到更多实惠。因而,对于这个市场搅局者,人们有更多期待。

按照常理解释,排除由于进货渠道等原因造成的药价差异,搅局者应该处于价格低位才是,否则就失去了引入的本意,贵到离谱更是显见的不正常。这个不正常,与这家药店明显存在着的两个问题有关。其一,未履行告知义务,剥夺了购买者的知情权;其二,靠着信息不对称的先天优势,随意定价,蒙一个是一个,涉嫌商业欺诈。医药本是良心事业,参与市场竞争可以,但要守规矩,不能乱来。当头脑中只剩下利益二字,便只会搅乱市场,伤害公共事业。

市场的事应尽量交给市场自发形成秩序,这是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有关方面回答问题的逻辑所在。但市场又不是万能锁,可以管住随意乱伸的手。如果只靠市场手段而少了行政手段,所有市场主体应平等对待的原则体现在哪?尤其像这种关乎民生口粮和安全的公共事务,如此倚重市场之手,无异于为野马解套,很难想象会按规则出牌。

市场法则做挡箭牌好使,却也无意中解释了药店变野马的内因,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提示警醒呢?相关部门应尽快补上自身短板,将责任担起来,该叫板的叫板,该处罚的处罚,该制定的制度抓紧制定。亡羊补牢引以为戒,而不是把诸如监管等这样的皮球踢给普通百姓,这才是最好的履职。

监管数据不是谁家“私坊菜”

■ 陈怀瑜 时评人

2月20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暂停执行2015年1号公告药品电子监管有关规定的公告》,并发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公告,决定暂停执行药品电子监管的有关规定。主要涉及删除或者修改涉及强制要求电子监管扫码归档和数据上传的内容。(2月23日《中国消费者报》)

食药监总局暂停药品电子监管数据上传,并对相关法规提出修订,对此首当其冲最为不爽者,是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健康”。因为,此前由其独家运营并使用相关数据的药品电子监管网,也将要移出去。公权力虽依法可以独占监管数据,

但却不能因此使其令某一利益集团独家获利,这正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政府监管数据,毕竟不是谁家“私坊菜”。

政府监管服务“外包”,这本是优化政府职能的一大好事。像国家食药监总局,将药品电子监管网运维交给强大体量的阿里巴巴,其初衷或并不错——“强强联合”实现强势出击。可今年1月,湖南养天和大药房将国家食药监总局一纸告上法庭,认为其强制推行药品电子监管码,并在未向公众公开标准和程序的情况下,将药品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交由阿里健康独家运营,认为二者有“官商勾结”的行政垄断、滥用行政权力开展不正当竞争以谋私利之嫌。

即使国家食药监总局并未从中获得

任何利益,但阿里健康作为从事电子医药、健康经营的企业,显然无法独善其身。其从中轻松获利且独家获得医药监管信息数据,这已是支撑阿里健康目前经营业绩的主要基石。所以,阿里健康与药监总局一道成为公众直指的牙头,其也是百口难辩。

公权力于强势地位下所得监管数据,即使用以用作商业开发,但只交付给某一利益者独占,显然有失公平公正,也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之规定相违——同时,这其中会否产生利益输送的想象空间,也很难让国家食药监总局于此舆论冲击中气定神闲。所以,其赶紧叫停与阿里健康的合作,并启动修法,这仍算得上是“迟来的正义”吧。

何不把“数羊游戏”交给市场去玩?

■ 郭文婧 自由职业者

陕西省、市两级政府对养羊户都有一定的补贴,但记者调查发现,对外宣称拥有万只的养羊场,却只有几百只羊,畜牧局说:“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养殖户说,每年都有政府补贴,“三年了我一毛没拿到”,官方解释是“每年要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2月21日《华商报》)

陕西的羊场骗补助,其实只是很多政府补助被骗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钱是“唐僧肉”,有权者掌握着“分肉”的权力,无论是否真的存在腐败,但诱发腐败的隐患一直都是存在的。比如,在“每年要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的“堂堂”机制之下,“我们这么多羊没拿到钱,田局长家的羊才几十只,却领了几十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动真格,问题就可以被查清,就可以得到处理和纠正。但是,如果政府补贴的机制不改,也注定只能是曝出一起查处一起,或者在运动式的整顿中稍有收敛。然后,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的政策用意依然被唱歪、用歪。

官方的解释之一,“每年要从不同的羊场中评选”,显然是站不脚的,因为这样就是奖励,而不是补贴。官方的解释之二,“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实际上也很清楚,不是数不清,而是不想数清。如果坚持“水至清则无鱼”非要数清,由官方来做,耗费的物力、财力、人力成本以及时间效率,将不可避免使这种补贴政策的初衷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是官员不愿做、也做不好的工作。实际上,无论是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规划,还是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这项工作应该也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做。

比如世界上家庭农场经营制度最为稳定的美国,从1862年开始绵延至今长达150多年,完善的价格补贴体系就是助力之一,具体包括贷款差额补贴、直接收入补贴、反周期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等等,但从一开始就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2014年的新农业法案改革,无论是价格损失保障还是农业风险保障,都是以农作物保险项目的形式来运作,更加突出保险在防范农业生产风险中的作用。政府只是对计算过程做了详细的规定,具体执行则由保险公司来进行。由于保险公司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从而就避免了骗补的问题,加之政府的监管,也避免了漏补的问题。

政府对农牧业的补贴政策理应与时俱进,在提倡和鼓励规模经营的初期,按照数量补贴是可以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若不引入市场机制,腐败、骗补等问题就大概率地会发生,或者效率就会极其低下。其实,这种操作也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交由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去完成。而且,制度的设计,也完全可以有所借鉴,将这种补贴分为若干类别,如贷款补贴、数量补贴、风险保障、价格补贴等,具体都以保险的项目加以运作。保险公司出于利益与风控,至少不会出现几百只羊号称“万只羊场”的“数不清”的问题。

现在,得益于舆论监督,问题已经曝出。解决问题,针对过去补助的情况进行核查,查处腐败和骗补的相关人员和官员,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查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还得检讨机制本身的问题,真正将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交给市场去做,政府专心做好制度设计和监管工作即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这不仅对陕西的羊场补贴如此,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农业补贴以及相关政府补贴制度,都是很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显然,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大数据时代正在来临,这其中,像具有独占优势地位的公权力部门,其虽可将监管服务外包,但如何操作和利用这些监管数据,以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了有关方面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监管部门不能以自身权力优势资源,来换取不当得利。如果可用于经济发展的监管数据,在做好保密性、安全性的基础上,也要公平公开公正地为所有经济体所使用。

公权力监管形成的数据,毕竟不是谁家“私坊菜”,因此,如果将其交给无相关利益的独立第三方运作,应是更佳选择——这也会让人们最为警惕的公权力不当谋利,更加无从下手。